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0)05-0800-01

“学术增量”是学科发展的根本

——评《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

黄相怀

政治稳定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转型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公共秩序。中国政治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对此做出自己的分析解读,作进一步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唐皇凤博士所著《社会转型与组织化调控——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组织化调控》),将政治学的理论眼光聚焦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找到了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理论与现实、规范与经验、宏观与微观的恰当结合点,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拓展了政治学的“学术增量”,其核心概念颇有理论穿透力。

《组织化调控》的基本理论假设是,在转型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构建公共秩序的主导力量,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根本保障力量。并且不断通过以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为主要形式的组织化调控来拓展国家治理空间,组织化调控是支撑中国社会平稳转型的核心机制。所谓组织化调控,唐博士把它界定为在特定的中国情境下,通过党的组织网络和政府的组织体系,并在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的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执政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使社会本身趋向高度的组织化,最终主要通过组织来实现国家治理目的的一种社会调控形式。其扎实的实地访谈与调研问卷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治安功能发挥的好坏与综合治理工作好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转型中国国家治理绩效取决于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组织是支撑国家治理与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

《组织化调控》的重要贡献,是大胆总结提炼了转型社会秩序重建的中国经验。中国经验集中体现为:执政党力图培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为社会转型和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的主体支撑力量;主要依托组织的力量,包括对传统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各种新兴组织资源的主动吸纳,在萌生制度化调控模式的过程中,通过组织化调控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与重构。其中的重要创新,就是发现在中国市场转轨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执政党不仅集中和动员体制内资源来应对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同时也在重新构建政党—国家与新兴社会、市场组织的有机联系机制,通过组织建设和组织网络渗透来延伸治理网络和拓展国家治理空间,进而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

与一般的工作性研究不同的是,《组织化调控》通过剖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揭示转型中国保持相对稳定的内在机理,通过分析组织化调控展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历程,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从实践到理论的提升,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增量”,这应该是最值得读者们快慰的。诚如林尚立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研究中国政治与研究中国的政治学问题是两回事,前者直接对中国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评判,以表达意见与主张;后者则是对中国现象,包括政治现象进行政治学的解读与分析,以提炼理论与增长学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应该基于后者。”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使政治学从“时评”与简单的“策论”层面脱颖而出,进行有学术价值和学科意义的研究努力。“学术增量”是学科发展的根本,对政治学而言,这句话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在《组织化调控》的“后记”中,作者引用了克罗齐的一句话:“具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并不在于他们总是能够发现别人未曾发现的东西,而经常在于他们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强调。”确实,唐皇凤博士选择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为研究对象,主题并非新颖,但却能够蹊径独辟,平中见奇,发人之所未发,体现了强烈的开拓精神,其投身学问之志,锲而不舍之力,入幽探微之心,不能不令学界同仁为之动容。

(责任编辑 叶娟丽)